

前 言

在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的基础上，临河第二辑文史资料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存真求实”的精神指导下，广泛发动各界知情人士，扩大撰写队伍，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开拓了文史资料的新局面。

现在我们共征集到各种稿件一百余篇，经过选择、整理、审定，又选出稿件十四篇，编为文史资料第二辑。因人力有限，编审人员水平不高，舛误失实之处，请不吝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临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室

一九八四年十月

临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 录

1	回忆同学郭北辰烈士	成继功
7	我护送洗衣等同志回延安的经过	边金泉口述 刘培荣整理
11	回忆“九一九”起义前后我在河套的见闻	刘培荣
29	国民党在河套的保甲制	张兆科 供稿 李雅轩 整理 王 明
38	我带白马连进套剿匪之经过	杨自立 走访 刘培荣 口述 李 财 整理 刘培荣
48	国民党在河套抓壮丁记实	李雅轩 供稿 刘熊飞 整理 王 明
55	日寇侵入河套暴行一瞥	郝维垣 供稿 王廷英 整理 赵欣业
60	对份子地开发史实的忆述	石满祥 口述 刘培荣 整理
70	解放前河套地区税征工作的见闻	王廷英
79	牛头告状的始末	白玉麟

83	二人台在河套的形成与发展	刘培荣
105	回忆侯野烽同志在临河民教馆的工作	高炳炎
111	昔日临河地区鼠疫流行见闻	刘来云 口述 刘二英 整理 王廷英
117	回忆温家圪旦鼠疫之惨状	王金科等 口述 杨自立 走访 刘培荣 整理

回忆同学郭北辰烈士

成继功

郭北辰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河套特委书记。一九四一年初在巴拉亥被国特逮捕，一九四二年慷慨就义。他的壮烈牺牲，是早期河套革命斗争的一个典范。他生前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事迹，是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学习的。

我与郭北辰同志是同乡，又是左云高小的同学。民国二十八年在抗建会学习时，北辰同志又和我一起编在行政组。当时刘进仁同志正在动委会任职。

北辰同志被捕后，几经转移，关在陕坝刘七柜、马兴龙院里。可巧我当时正在省府（伪绥远省）财政厅当办事员。宿舍在西沙壕高成仁家，相距只有几里路，我二人因有同乡之谊和同学关系，所以我曾前后两次探监，并给他送过两次生烟。他曾趁看守不备之机，让我给他找一个名叫王绍祖的人。因为他没有把详情告诉我，这件事也没办成。至今，我也不知王为何人。

北辰就义时，被渡口乡保长杨四存和一个羊倌无意发现，埋在该乡訾秉红的沙窝里。

一九五三年，我协助组织，才找到了烈士遗体。

郭北辰同志，曾名郭俊卿，字墨园，山西省左云县驻马堡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因家境贫寒，小时候只念过两个春冬的私塾。后又在半耕半读的流浪生活中苦度岁月。

一九三〇年到本县高小上学半年。以后，他为谋生东奔西跑，曾两次到太原住职业中学和兵工炮弹三厂学徒。但在旧社会，他既没有门路，又没有依靠，都在中途被裁减返家，饱受了失学和失业的痛苦。他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是极为不满的。

一九三三年来绥远参加傅作义办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受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他在兴和、归绥等地任乡村工作指导员。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寇进攻绥包，他和李石英同志，背着行囊，怀着激愤的心情退到河套，住在陕坝。在游击军政训处李仲权（李当时为中共党员）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他被派到连队任政治指导员。

一九三八年，由于游击军被改编，政训处遭监视而解散。北辰同志又到了五原。同年由特委派往五原工作的刘一山同志（现在国务院工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实现了多年来要参加无产阶级革

命的愿望，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北辰同志入党不久，就被党组织派到安北县游击第二支队工作。

一九三九年，他离开这个部队。在此期间，他和其他同志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建立了小学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民众抗日后援会等组织。这时他又担任了该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北辰同志目睹河套局势紧张，民族危亡严重，因此痛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同时又受我党领导的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汹涌澎湃的影响，他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从而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农民对他视如家人。

一九四〇年，他在该县以当小学教员作掩护。同年冬天，他带领两个十三四岁的同学一个叫狄志明，一个叫王玉林，送往陶力民。他们走到黄羊木头，遇着下大雪，路不好走。他急中生智，自己在前边走，让小同学踩上他的脚印在后边跟着走。送到陶力民后，组织上又派人把这两个小同学转送延安学习。临别时，北辰同志安慰他们：“过些时候我来看你们……”从此，使这两个孩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北辰同志对其他同志也关怀备至，总是先让

别人干轻松的工作，他自己挑繁重的担子。因此和同志们关系是特别融洽。

一九四〇年底，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河套星罗棋布。他们到处抓共产党员，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有些同志转移了，有些同志隐蔽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北辰同志在这种极端险恶和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斗争。当时临河县委书记刘鸿生同志不幸病故，他接替了县委书记的职务。

一九四一年初，北辰同志被叛徒出卖，为绥远省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张中一所逮捕。

北辰同志被捕后，敌人怕群众劫狱，管押他的地方换过好几处。起先在陕坝附近，而后押到张维世圪旦，后又押到刘七柜，最后移至集中营附近的马兴龙院内。这证明敌人是很空虚和害怕的。

北辰同志被押不到三年时间，他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拷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灌煤油等酷刑。但每次动刑，都被他痛骂一顿。在数次审讯中，他只是名正言顺地说：“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咱们共同抗日多好。难道我犯了爱国罪？”

经过敌人多次审讯，他受尽了折磨。特别是长期带上那沉重的手铐和脚镣，他已遍体鳞伤，

腿也拐了，不象个人样。可是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而饱满的革命情绪，有时就给看管他的士兵讲故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经他教育后，看管他的人深受感动，对他的监管较前也松了，来了信件很快就递到他手中。有的士兵对他动刑时，还暗自落泪。

敌人的严刑拷打，只能对那些贪生怕死的软蛋起作用，而对一个硬骨头的北辰来说，是没有丝毫作用的。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以后，就换了软的办法。

首先由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张庆恩亲自出面，设宴招待，妄想用人情诱惑北辰同志背叛自己的党，出卖同志。这个卑鄙的企图，遭到北辰同志的翻桌拍案大骂。后来这个特务头子又用更阴险的办法让叛徒陈元甫用苦肉计接近他；派女特务给他洗伤，施行美人计，但北辰真是“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彻底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未达到他们可耻的目的。最后一着，就是绥远最高长官傅作义亲自来召见北辰同志。在谈话中，北辰同志理直气壮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我们如能合作，放我出去，共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第二，如果不能接受我的意见，就把我送

回延安；第三，如果你既不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又不同意把我送回延安，你就马上把我枪毙了。

这位高级长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北辰同志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他恼羞成怒，返回去就指使特务头子下毒手。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特务头子派凶手袁涛秋、胡存信等三人，手持匕首、手杖刀，秘密将郭北辰同志用白马车拉到沙沟堰的西沙壕。他们挖了一坑，凶手袁说：“要活埋你！”北辰同志说：“我早知道了”。

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自动跳到坑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见他喊口号，连忙朝他身上打了三枪，还刺了几刀。北辰同志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二岁。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写于干召乡永丰九社

我护送洗衣等同志

回延安的经过

边金泉口述

刘培荣整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奉令调到山西把守雁门关。同年十月，与日寇展开忻口会战。在忻口将要陷落的前数日，阎锡山又将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调守太原城。十一月七日，在日寇机械化兵团强大攻势下，太原失守，傅作义又率部突围进入交城山。一九三八年初，傅作义又率部转战晋西隰县、离石一带。在八路军协同作战下，始稳住了阵脚。随后傅作义担任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司令部迁到柳林镇，即开始整训部队。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傅作义合作抗日，故特派潘纪文等同志到三十五军成立了军政治部，接着又建立了师团政工机构。并为增强抗战必胜信念，进行连队政治思想教育，责成于纯斋到西安招收了一百余名流亡的学生，经过三个多月的速成训练，分配到各营连去担任政工人员。所招收的学生大都具有高中程度，有的

还上过大学。其中一部分是从延安革命熔炉里陶冶出来的优秀青年。当时三十五军由军到连的政工人员，多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这些同志生活上吃苦耐劳，工作上踏实肯干，行为上廉洁奉公，善于联系群众，尤其不谋私利，不讲待遇，深受广大官兵所信赖。政工人员不论职位高低，每月只领二十元津贴费。特别是转战到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时，因大量补充兵员，供给困难，吃野菜，穿草鞋，与士兵同甘共苦，人皆如此。三十五军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各级政工人员，就是以这些模范行动，为部队官兵和友军所佩服，产生了永不磨灭的良好影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武功会议后，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三九年春，傅作义率三十五军的一〇一师董其武部、二一一旅孙兰峰部，到达后套境内。副长官部在五原宣告成立，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即由蒋介石供给部队粮食和军需物资。随之蒋介石派姚大海来三十五军建立国民党特别党部，并派蒋的侍从室中将秘书长张彝鼎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为副主任。在部队中实行了蒋介石军队的一套政工制度。为此，在三十五军政治部工作的潘纪文同志和二一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志浩同志于七月份以后，相继离开傅部，回到延安。时隔

不久，大约是同年十月间，傅作义指派解德轩、陈化民、边金泉三人，以赴陕北慰问三十五军伤兵小组的名义，将在傅部公开和半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护送延安。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计有三〇一团政治主任李刚、四二〇团政治主任李仲、战区政治部少校科员王某、奋斗日报社的左青和左清芬、四三六团政治主任洗衣，还有二人记不起来了。当时以十一人组成的慰问小组，除护送的三人外，其余八人都是共产党员。推定洗衣同志为组长，责成边金泉承办食宿等事宜。临行时，每人发给壹百元路费。因交通工具缺乏，就徒步登程。我们一行十一人从陕坝出发，经渡口堂，过黄河，到达榆林。该地因属八战区副长官统辖的防区，所以诸多方便。其时邓宝珊是榆林军政首脑，对我们这个以慰问伤兵名义而过境的人员，非常关照。我们在榆林住了一日，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徒步到了清涧县城。清涧是国共两党的交界，但县城为国民党所统治，故对前往边区的人员及物资，一律查禁。当我们到达清涧时，即受到当地保安司令部特工人员的盘查和刁难，并严厉声言不准过境，让我们返回原地。虽经洗衣同志向该保安司令部一再进行交涉，亦无结果。正在卡壳为难之际，可巧我三十五军装运冬衣的汽车由此经过，我就去找军需处负责人茹

麟阁说明情况，由茹处长和我一同去保安司令部见到他们的陈司令。茹处长态度庄重、理直气壮地说明，在清涧以南尚有三十五军的伤兵，急待慰问归队。并把我的身份也作了介绍，说我是傅作义的少校随从副官，是傅的亲信。这才获得陈司令的点头应允，让我们明日去办过境手续。第二天我和陈化民一同去见陈司令，并将副长官部所开的护照让陈看过后，陈仍想刁难。但在我们据理申言下，他才无可奈何地勉强答应了。即在我们所带的护照上，给盖了一个准予放行的印信。返回头，我俩见到冼衣等同志。我们商定了立即连夜动身，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所以人人精神抖擞，路过盐池奔向延安。到达目的地延安之后，我们兴高彩烈地住在青年旅社，看到解放区的一切，无不使人欢欣鼓舞，给了我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先期回到延安的鲁志浩同志，亲自到青年旅社看望了我们。他亲切的谈话，及今仍在我的脑海中萦回。我和解德轩完成了护送任务，在延安停留了两天后，才联袂返归陕坝。陈化民同志不愿再回傅部，留到延安抗大学习。自一九三九年傅部进入后套投靠蒋介石以来，先后从三十五军投到延安的有志青年，约有一百余人。他们的进步行动博得傅管区好多人的赞赏，同时也幸免了四〇年以后在傅部进行的大搜捕。

回忆“九·一九”起 义前后我在河套的见闻

刘培荣

一、当时的形势与绥远国民党的困境：

一九四八年秋，从全国整个形势来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十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十二月中旬，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杀。接着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家口解放，孙兰峰的十一兵团和安春山的一〇五军全部覆灭。由东北入关的解放军野战兵团，协同华北解放军，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塘沽，控制了平津塘三角地带。傅作义对冀察绥的统治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军政人员终日惶惶，悲观厌战情绪与时俱增。

傅作义为了寻找退路，保住回归河套的基地，当绥包形势日益紧张之际，特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前来包头坐镇。另外还加上一个副总司令冯钦哉（前察哈尔省主席）。邓宝珊尚有

他自己的基本部队，即陕北榆林高双城二十二军二二八师杨仲黄所部的两个团：一团王永清，二团石侃久和一个特务营，连同包头市警备司令孟昭第所掌握的保安团队，以及西公旗郝游龙的一个骑兵保安团，总共合起来也不过五千人。而冯钦哉是个光杆司令。邓宝珊到了包头后，立即对包头所有兵力作了一番部署。同时督令民夫、士兵、机关公务人员等，大肆挖战壕，加强城防设施。从西北门外到东南城下，军民自备干粮铁锹，夜以继日轮流不断地涌向工地。劳民伤财，一直折腾了半个多月。诚如包头人所说：“两个老汉一百三十五，把个包头给害了个苦。”

当解放军对包绥采取“围而不打”的形势下，绥远省政府指令绥西各县从速筹集小麦，河运包头，换购自卫枪支。其时米仓县新教等六乡已遭严重冰雹。我以县参议长身份，晋省呼吁灾情。县长张风来责成自卫团长李俊峰、参议员魏海峰，押运小麦四百绥石，赴省洽购步枪一百支，掷弹筒四个。我在十月初路过包头时，为减免灾区负担，制造舆论起见，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影响，敦请省方考虑。随之我到了归绥，目睹市面惶乱，物价飞涨。一个商号的对联上写着“目下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到了省府大院接头办事，感到处处为难。省府已形成

半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势力各行其事，权责不统一，省主席董其武亦难左右一切。

我等十九日上午返抵包头，住在复兴和。晚上去看晋剧名角水上漂的《西厢记》时，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解放军大举西进，先头部队已占领磴口车站。郝游龙的保安团在古城湾受到打击，已退回包头城郊。顿时，剧院一片混乱，戏也唱不下去了。我急忙回到复兴和，给邓宝珊打电话，请示可否返米仓，有无军车能搭。邓的回话说：“你即刻整装来这里，听候行动。”我见到邓宝珊已是午夜零点。他故作镇静地说：“我们为避不利，找胜利，打算暂时放弃包头，向西山咀转移。我已让机关学校在拂晓前全部撤离包头。部队也作了撤退准备。为能轻装速退，笨重物资也不便运载。”及至后半夜二时五十分，我搭上了邓部的军车，出了包头西北门，一直向西奔逃。一过山咀五毛计、扒子补隆、蔡家地，路过新安镇，在县府稍事停留了一会，于二十日午后一时半，到达五原县城。在会元房吃饭时，我与刘惠之县长交谈了几句，随即星夜赶回陕坝。那次和我同坐一辆军车逃往陕坝的有包头士绅李聚五、牛申之，韩梅圃等人及家属。邓宝珊、冯钦哉因召见安北县长王元魁面授机宜，并对西山咀设防有所部署，故于二十二日始到陕坝。退败之兵，

如惊弓之鸟，还未见到解放军的身影，就魂不附体地退出了包头城。所有退却下来的部队在十月二十三日大都云集西山咀一带。为了阻止解放军入套，采取了烧桥办法。国民党当局发动居民和士兵齐往西山咀大桥搬运柴草，一把火将巍巍大桥全部烧毁了。乌加河西山咀大桥是通往后套的咽喉要地。抗日战争时期，对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桥，傅作义历来都派有重兵把守，孰料一火尽成灰烬。

十月二十六日邓宝珊在陕坝召见米仓、狼山、临河、陕坝等地的县长、参议长以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和部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听取守护后套的意见。冯钦哉是个老迷信，他见人就说：

“今年太岁在西北，千万不能在西北上动土。包头筑城防工事，因为在西北门外动土，使我们遭到不幸，应该接受这一教训。”邓宝珊根据情报资料，向我谈话时说：“我们退出包头后，唱了两天空城计，共军第三天才进入包头。”又说：

“共军是由高克林、周士第、张达志所率领，他们军容很整齐。绥蒙主席杨植霖、统战部长潘纪文、还有郑天翔等党政人员，同时进入包头。共方发表李维忠代理包头市长，看来共军是要在包头呆下去了。”听了邓宝珊这一席谈话，我对守护后套更加丧失信心。何况有些豪门、巨富、官